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法] 路易·阿拉贡 著

Louis Aragon



La Semaine sainte

圣周风雨录

李玉民 译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Louis Aragon

[法] 路易·阿拉贡 著

La Semaine sainte

圣周风雨录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周风雨录/(法)阿拉贡(Aragon, L.)著;李玉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659-9

I. ①圣… II. ①阿…②李… III. ①历史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4780 号

Louis Aragon

La Semaine saint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圣周风雨录 [法]阿拉贡 著 李玉民 译
责任编辑/冯 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415,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659-9/I·3327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 F·20 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 F·20 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

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

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

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

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绩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

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临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

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着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

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不有一个极为张扬的

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 年 4 月

• 译本序 •

辉煌的历史画卷 深刻的历史哲理

柳鸣九

这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以历史事件为描述内容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它所处理的题材，是法国 19 世纪前 20 年间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反复斗争中极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历史，即史书上所谓的“百日政变”。对于熟悉那个时期历史过程的读者来说，百日政变本无需多加介绍，但考虑到外国文学普及面在我国远远大于外国历史知识的普及面，也考虑到这本小说中众多人物的生活经历无不涉及那个时代的社会变故、世道沧桑，我们觉得仍有必要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简要的概述：

1789 年，法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高潮阶段，反映了平民阶层意志的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手段成功地镇压了国内贵族阶级的反抗，抵御了国外封建君主国的军事干涉，把这场革命推进到最彻底的程度。热月政变使政权落到了大资产阶级手里，但国内政局不稳的状态与来自国外的威胁，要求法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对外战争中曾建树功勋的拿破仑·波拿巴自然成为了理想的人选。1799 年，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1804 年正式称帝，成为了法国的独裁统治者。拿破仑的帝国，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旨在以强力手段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它与欧洲的封建君主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联盟进行了频繁战争。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在欧洲的征战，把资本主义关系带到了法国境外，破坏了这些国家里各种封建的形式，他的赫赫战功使法兰西的光荣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几乎整个欧洲都臣服在他的鹰旗之下。但他的一些失误与 1812 年征俄战争的惨败，使他迅速走向崩溃，英、俄、普鲁士、瑞典、奥地利等国趁机组织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 年，联军攻入法国，被 1789 年大革命推翻了的法国王室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重返巴黎，路易十八重建起波旁王朝。拿破仑被迫退位后囚禁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封建复辟王朝在法国不得人心，它复辟大革命前旧秩序的企图引起了法国人的恐惧与敌视，拿破仑利用了这个形势，于 1815 年 2 月 26 日逃离厄尔巴岛，3 月 1 日在法国登陆，发表宣言号召“拔掉那早已被我们民族抛弃了的百合花旗，把三色国旗高高竖立起来”，他一枪未发，所到之处纷纷归顺，3 月 18 日，拿破仑原来的旧部内伊元帅率波旁王朝的大军投诚拿破仑，波旁王朝惊恐万分，路易十八于 3 月 19 日仓皇从巴黎出逃，奔向比利时。3 月 20 日，势如破竹的拿破仑进入巴黎，宣布恢复帝国。欧洲君主国又组织了第七次反法联盟，1815 年 6 月 18 日，联军与拿破仑会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大获全胜，拿破仑受此重创，于 6 月 22 日宣布退位，波旁王朝又重新得以复辟，直到 1830 年被七月革命推翻，法国的政治统治权又落到了代表银行家利益的七月王朝的手里。

《圣周风雨录》选取了这个时期拉锯战历史中的 1815 年“百日

政变”，从内伊元帅叛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引起恐慌到路易十八及波旁王朝由巴黎逃入比利时境内的短短几天，再现了这个年头从棕枝主日到复活节的圣周中法国的政治风云变幻。阿拉贡把他小说的描述“镜头”集中在从巴黎到比利时边境的出逃线上，描写了这一批显赫贵族、这一支庞大的护卫随从与羽林军的队伍在凄风苦雨之中、泥泞道途上的艰难跋涉情景：路易十八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将帅们陷于尴尬困境、指挥不灵，大队人马在寒冷、饥饿、疲劳中混乱不堪，成为了乌合之众，追随着在保王忠诚的外表下隐藏着沮丧情绪、矛盾困惑与应变打算。从这一部分形象内容来说，小说可以说是一卷历史的政治逃亡图。阿拉贡作为一个共产党作家，作为一个熟悉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作家，他对19世纪前一二十年间的历史曲折与反复所持的基本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因而，他以讽刺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个已被历史否定了的王朝、这一群已完全过时、仅仅依仗外国势力的支持而在政治舞台上还要弥留一阵的人物。他对这些人物的描绘并不流于漫画化，而是在节制与分寸之中达到微妙的效果，可谓一种上品的讽刺：他以拟古典主义的风格写贝里公爵出逃前与情妇告别的那种悲壮的姿态与感伤的话语，同时让这个女人的内室里藏着她另一个共和党人情夫；他在叙述黎塞留公爵在出逃时因裤子里金币的摩擦致使屁股受伤之后，又以他那表述了贵族阶级社会历史哲学的文雅精妙的清淡，中和了这一个粗鄙的情节；他写到路易十八的举棋不定、反复无常、饕餮铺张以及在逃亡途中的虚张声势时，写到元帅前来勤王、受命指挥全军而手下却无一兵一卒可供调遣时，几乎没有露出讽刺的表情而又收到了讽刺的效果。正是以这种把主观倾向深藏于现实形象之中的春秋史笔，阿拉贡为这一批显赫一时的历史渣滓在历史事件关键时刻的状

态，提供了绝妙的写照。这些人物的悲喜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已经注定了的历史命运历史地位、他们出逃时的种种窘态与他们虚夸的架势、他们以国家为私物的天命感、他们自居于万民之上的优越感之间的尖锐矛盾。

这一支浩浩荡荡的流亡队伍，从巴黎向北逃窜，经由圣·德尼、博韦、阿布里索、贝蒂讷、圣波勒等地，所到之处就像一大群乌鸦引起惊恐不安、困惑疑虑以及在百合花旗与三色旗、路易十八与拿破仑、古老的封建传统与1789年以来的既成事实、保王阵营与共和阵营之间进行选择的急迫性。阿拉贡随着这一个逃亡的人流，把法国北部地区的省城、小镇、农舍、田庄、古堡、手工工场、贵族府第、小酒店、杂货铺等等都一一尽摄入他的镜头之中，提供了一册册历史地方志，绘制出一幅幅真切生动的历史风物画。他除了让人们在这一逃亡的人群中看到路易十八、后来成为查理十世的阿尔图瓦伯爵、贝里公爵、黎塞留公爵、马尔蒙元帅、马克多纳尔元帅等等这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外，还在他们的周围、在逃亡的沿途上，安置了较《奥尔良的葬礼》更为丰富得多的社会群像：宫廷贵族、王室侍从、显贵的命妇与被供养的女伶、省府的官员、保王的法学院大学生、拥护拿破仑的下级军官、命运不由自主的军队士兵、随风转舵的将领、资产者、律师、各种手工业者与各种工匠、农妇、小店铺经营者、田庄主人、密谋的共和派……构成了1815年法国各社会阶层的缩影。而他在描写所有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前的现实表现与真实心态的同时，又把笔触超越出眼前的第一重空间与现在的实际时间，而伸向历史的第二重空间与人物的“心理时间”，从而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来到当前事变的整个法国当代历史的无数碎片，

而这些碎片正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三十年来历史反复的全貌。所有这些使《圣周风雨录》成为了规模宏大、气势浩然的历史油画，它以其对 19 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辉煌描绘，使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拥有了以历史为题材的《战争与和平》式的力作。

这是一部具有非常严肃的目的的小说，在这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者有意识摒弃了对任何通俗趣味与叫座效果的追求。在第六章中，有一个外省少女被羽林军军官奸污的情节，作者特意放弃了就此绘制一幅性与暴力的场景，而大写这个军官的贵族家谱，把他作为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以他来概括数百年来封建阶级的强权与对平民的蹂躏。小说作者所专致追求的，只是作品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他显然是要以自己的艺术力量来复活过去时代的历史，并力求达到真切如实、栩栩如生的程度，因而，他的这两种追求往往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在小说里，阿拉贡显示出了他历史学家般的广博与精微，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历史掌故之丰富细致程度是令人赞叹的，从宫廷内幕、上层关系、官职沿革、军事布防、部队调遣到旧城面貌、工商贸易、耕稼农事、生活习惯、器皿用物，均无不了如指掌。他经常是兴致勃勃地利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不厌其详地描绘那些历史场面、历史细节与历史风貌。他对历史生活的五光十色特别着意追求，在他笔下，仅军队的各色戎装、各阶层妇女从小帽到衣裙的各色装束、平民百姓的种种衣着，就呈现出了缤纷的色彩。他在自己创作后期的这部小说里，的确显示了非凡的现实主义描绘的才能，使读者在他绘制的历史图景面前，有亲身经历着那个历史氛围之感。这正是《圣周风雨录》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达到了高度艺术水平的一个标志，是它作为 19 世纪真实历史画面的价值所在。